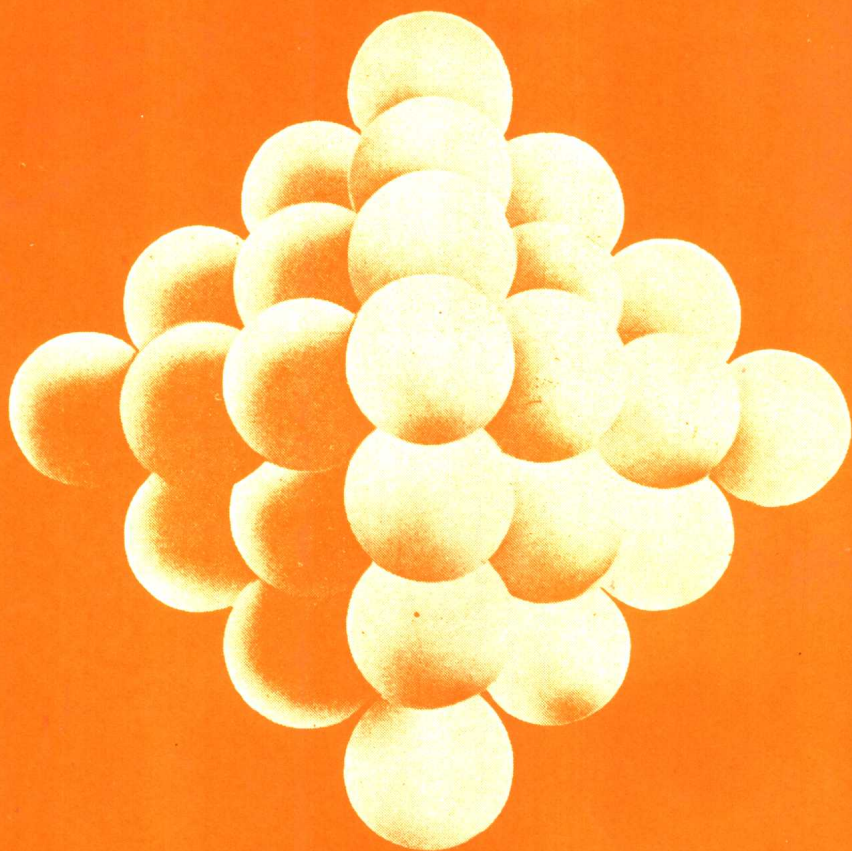




刊叢學文新國中

集選自皇心劉

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



自敘

——我在大時代的浪濤裡——

一、劉口劉氏

我在民國四年（一九一五）陰曆三月十八日（陽曆五月一日），生於河南省葉縣城西南十五里劉口莊，爲劉家的第十二代。世系表如下：

劉開山——劉建南——劉念天——劉叔模——劉拾遺——劉舜——劉子義——劉梅——劉萬松——劉景翰——劉士林——劉心皇。

家譜源流考略中說：「若夫吾劉口之劉氏，遙遙華胄，郡望彭城，帝堯陶唐氏後，由魯陽（古國名，即今魯山縣）堯山而遷於此，三千餘年矣。進士劉希夷，爲唐代詩人，有集十卷行

世。儒醫劉念天，於明亡後，隱於家，謹言慎行，仁心仁術，賑災救難，活人無算。臨終遺囑云：『吾氏以耕讀爲業，誠孝爲本，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望後世子孫，祇求心安，不求聞達。』當時，奉行遺囑者，在滿清專制政體壓迫之下，善體遺囑之深義，父以教子，兄以教弟，終清之世，二百六十有八年，無一人求科名，無一人求仕宦。』揆之情理，非不欲富貴，實慕隱者之清高，並藉以遠異族治下之禍耳。

作此不事異族治下之官吏的遺囑者，就是我劉口劉氏的第三代念天公。我父親譚士林，母親名郭冕。父輩三人，長土坤，次土信，父行三。我父親少從軍，歸隱後，地方公推爲民衆自衛團長，指揮民槍，綏靖地方，在方圓百餘里之內，享有盛名。

二、十年代（一九一〇——一九）

我是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出生的，我只佔十年代中的後五年，也就是民國四年到八年。我的年齡是從一歲到五歲。這五年中特別值得提起的大事，是：袁世凱稱帝，宣統復辟，和五四運動。

袁世凱在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十二月十三日，受百官朝賀，算是皇帝登基了，並改明年爲洪憲元年。可以說我降生的那一年，便是袁氏登基的一年，正是民主受挫折的一年。不久，引起

全國反對，到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下令撤消帝制，五月病死。據父老們講：在河南當時張燈結綵慶祝皇帝登基，後來，又對袁皇帝之死隆重誌哀。六年（一九一七）七月，張勳又捧出宣統皇帝復辟，恢復清朝體制，一般舊臣遺老，又都受了封賞。這場沐猴而冠的鬧劇，只演了十二天。但是這一信息傳到家鄉，又引起一場慶祝，原因是民國成立後，大小野心家都突出活動，使捐稅和治安都比不上清朝，民衆頗有懷舊的心思，這是民初的當政者應該深深悔悟的事。八年（一九一九）五月四日北京的學生運動，口號是「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愛國運動，但因當時北京政府的壓迫，演變發展而推動了新文化新文學運動，提出了民主的口號，以反對中國社會的不平和不民主。提出了科學的口號，以反對中國思想的不科學。於是，對舊社會、舊政治，都持反對態度和懷疑態度，掀起疑古的高潮。白話文的勝利，引發了新文學的創作，同時，對西洋的學說、思想、和文學，都作了大規模的介紹。中國在思想上，從此進入了新時代。

這一時期，在我的家鄉，大一點，從河南省來說，是袁世凱的故鄉，他滿腦子的帝王思想，嚴防新思想進入河南，所以，國民黨當時在河南從事地下活動的時候，犧牲最大，黨員被砍頭或被活埋的很多，都是漂漂亮亮的優秀青年，令人痛惜不止。小一點，從葉縣來說，它的北邊緊鄰寶豐縣，這個地方，經常出土匪，有名的白狼、樊鍾秀（樊後來投效孫中山先生）、李老末、王泰等，都是寶豐縣的。他們把土匪組成，俗稱「拉桿」，第一步便要踏進葉縣，我的村莊又距縣

城西南十五里，正是他們路過的地方。他們過來時往往是在夜裡，一路上把村莊的房舍燒然，火光冲天，一連數十里，在黑夜中看去像一條長長的火龍。鄉間的「三國演義迷」便說：這便是火燒連營七百里。想到劉備伐東吳的故事上去了。

那時躲藏土匪的洗劫，不叫逃難，叫「跑荒」。那是全靠運氣的，因為聽說土匪來了，有的從鄉村跑到寨垣裡，有的從寨垣裡跑到鄉村，說不定在那裡會遇到土匪的。遇到土匪時，那就慘了，會被洗劫一光，婦女們有時還會被姦淫。有時剿匪的軍閥的軍隊在土匪的後面追，把土匪搶過的再搶一次。所以，有「匪過如梳，兵過如篦」的說法。

我便是在這種荒亂中生長，並由祖父教我識字的。

三、二十年代（一九二〇——二九）

二十年代的十年，是從民國九年到十八年。我的年齡是從六歲到十五歲。這十年，中國是在驚濤駭浪中度過。值得特別提起的大事件，是：直皖戰爭、直奉第一次戰爭、吳佩孚洛陽練軍、曹錕賄選總統、直奉第二次戰爭、逐宣統出清宮、中國國民黨改組、黃埔建軍、孫總理逝世、北伐、清黨、編遣會議。

直奉第一次戰爭，曹錕、吳佩孚的直系大勝，吳佩孚在洛陽練軍預備武力統一中國，康有為

賀吳佩孚五十壽辰的「對聯」說：「牧野鷹揚百歲勳名纔半紀，洛陽虎視八方風雨會中州」。可見吳軍之盛。曹錕乘勝，昏了頭腦，用五千元一張票賄買國會議員，竟當選總統。引起南方反抗。直奉第二次戰爭，直系馮玉祥被日人收買倒戈，張作霖勝利。馮玉祥在北京將宣統溥儀逐出清宮，使宣統結束了在民國境內的清宮小朝廷生活。中國國民黨改組，總理孫中山先生容共聯俄，並命蔣中正先生爲軍校校長，在黃埔建軍。孫總理爲謀和平統一到北京，不久即因肝癌逝世。蔣先生領導革命軍東征北伐，由於俄顧問鮑羅廷挑撥離間和共黨份子的陰謀篡黨，遂清黨，造成寧漢分裂，北伐一度受到挫折，嗣後共黨到處暴動，從此成爲叛亂集團，過流寇生活。蔣公繼續領導北伐，到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勝利成功。十八年元旦，召開編遣會議，因編遣過早，又引起戰爭，餘波盪漾，紛擾數年。

在這十年中，我從家中祖父教我識字，又到私塾中拜師，開始讀三字經、百家姓和四書、五經，後來，又讀了四書的朱熹集註。

當時，家鄉中大股土匪由寶豐縣，經過家鄉到別處去，只是像蝗蟲過境，所到之處是一掃而光。小股土匪，則是隱藏在縣境內的，真是所謂的「此伏彼起」和「晝藏夜出」的小賊行動。父親是民衆自衛團長，終日率領自衛隊，清剿土匪。那時的情景，現在還記得清楚的，是院中經常有被綁在柱子上的搶劫犯人，許多鄉民圍着他們問長問短，有時也曾看到過嚴刑拷打過。——所

用刑具如鞭子、板子、棍棒、烙鐵、夾棍等等，多數是從舊戲和舊小說中得來的知識。所以說三國演義、水滸傳、封神演義等小說，是過去民衆教育的課本，民衆的立身處世的方法，多數是從這些小說中學來的。也常見到牛車運送或挑夫擔挑的土匪的頭顱，是舊小說中所說的首級。有的血肉模糊，有的瞪眼怒目，有的還露着金牙齒。牛車中頭顱的數目，通常是四五十個，挑夫擔挑的是兩個籬筐，每個籬筐的頭顱的數目是三或五個，最多的到十個。這些人頭，有的是軍閥的軍隊砍下來的，有的是自衛團砍下來的。這種人頭落地的慘象，給我的印象最深刻。這樣沒有經過法律審判胡亂殺戮的結果，竟使土匪不敢猖獗，百里以內的民衆得以安居樂業。

我是獨子，上沒有哥哥和姐姐，下沒有弟弟和妹妹。父親和母親的希望，完全寄託在我一個人的身上，督責很嚴，在日常生活中事事受到干涉，真是弄到「坐着不是，站着歪」的地步。這事對我的影響最大，使我對後代採取放任主義。

我在家裡沒有哥哥弟弟姐姐妹妹的互相稱呼，在族中輩份又特別的高，我還是小孩子的時代，便有許多滿臉鬍鬚的人喊我爺爺，伯伯、叔叔。這事對我的影響也不小，使我的口不甜，——不會對人尊稱，不會卑躬屈膝，同時，又好打不平，好批評。這種態度處在「鄉愿滿天下」的社會，便非吃虧不可。

北伐軍勢力到達河南時，是馮玉祥的部隊，當時，提出的口號是「無紳不劣，無土不豪，無

商不奸」，農民協會到處抓人，視人命如草芥。原來是共黨份子在領導着使社會陷於恐怖的狀態。一般社會露頭露臉的人都藏起來了。不久，清黨，共黨份子失敗，社會又漸恢復安靜，藏起來的人，都又照常辦事了。總統蔣公當時是北伐軍總司令，假如那時不清黨，整個大陸便會立即赤化了。由於蔣公領導清黨，那時在大陸的人，雖處在戰亂之中，但仍能過自由生活者有三十年之久。在這三十年，當時恐怖共黨份子的人差不多都謝世了。所以，我說我們的上一代人，也就是父親那一代的人，沒有受到共黨的清算鬥爭的迫害，都要感謝蔣公。也可以說蔣公是替民族盡了大孝了。

四、三十年代（一九三〇——一九三九）

三十年代的十年，是從民國十九年到二十八年。我的年齡是十六歲到二十五歲。在這十年中，比二十年代的世局更複雜更激化更震撼人們的心靈。北伐完成之後通過了中原大戰、國民會議、大水災、九一八、日人製造「滿州國」、一二八、政府遷洛陽、福建、兩廣的事變、五次圍剿、左翼作家聯盟、西安事變、七七事變全面抗戰、汪精衛叛國、吳佩孚死節等大事件。

在這一時代中，我父親以自衛團長的身份維持地方治安，有數年的時間，終於在大股土匪（約有六七千人之多，）過境時，將我們家鄉一帶團團圍住。同時那通匪的汪姓大佃戶高福寬勾結

匪首李老末，大肆活躍。平時比較恭順，沒有將他拿辦，但他總以爲我父親不除，影響他的活動。這時，他鼓動李老末通知我們居住的距離劉口三里的瓦店營鎮，說是要洗劫瓦店營，假如不願洗劫時要我父親親自去和他商談條件。鎮中的父老以寨首（鎮長）王耀南爲首，怕洗劫帶領很多人哀求我父親去商談。那時，我雖然年紀小，曾建議父親說：「你是自衛團長，平素負責剿匪的，現在雖和這大股土匪沒有什麼仇恨，但地方上的小土匪仍然是敵人，會和李老末說不利的話，你要去了，絕對凶多吉少。」父親說：「爲救全寨的五百多家，一兩千人的生命財產，是值得這樣作的。」因而沒有聽我的建議。竟然到李老末盤踞的汪營（在瓦店營南半里）去和李老末商談。一到那裡便被扣留了。寨首王耀南負責交涉，又經過十天的折衝，以手槍十五支，長槍五十支，銀元一萬元的代價，將父親贖出。當時，高福寬與李老末的部下小匪首陰謀，在送回父親的路上下手將父親謀害。幸虧在他們商議時，被父親聽到，秘密告訴交涉的人，使王耀南要求李老末保證交人不能在路謀害。記得在那天夜裡交槍交錢同贖人時，李老末竟有流氓義氣，說是既然要槍要錢，便不能傷人。假如傷人又何必要槍要錢？命令部下不准傷害，並且親自拿着手槍送人。父親得以安然回到家裡。父親大腿上的肉被打得稀爛，不能走路，是抬回來的。父親被毒打時曾看見高福寬在旁邊挑撥。這時，才深自懊悔對這種通匪的人太寬大了。我父親同贖的第二天李老末的大股土匪便拉走了。這一次，用以同贖父親的槍和錢，都是我家自己的，但却救了

全寨人的生命和財產。父親在家養傷三個月，才漸漸痊癒，但將痊癒的消息保密，惟恐被高福寬知道，被他逃走。記得是陰曆八月十五仲秋節，當天早晨高福寬要到寨裡買菜，說是過了節，便直接下水作土匪去，深恐我父親知道李老末扣留的事是他搞的鬼。父親在寨東門裡佈置了埋伏，高福寬被逮捕時，要我回家報信，父親才從家中出來解決他。當我看到將高某綁住時，要回家報信，因為心情特別緊急，竟然沒有開步先向前跌了一交。這印象特別深刻。

我父親率領幾十個人把綁着的高福寬向縣城中送請法辦。高福寬知道他罪孽深重，一定不免，面如土色，只時時刻刻要水喝。從東寨門送出，剛走半里路時，有幾十個土匪從後面趕來，喊着：「留人！」這時，父親知道是土匪來劫人犯的，便向正走着的高某開了槍，高某倒下之後，又用二十發的手槍，從他的頭上打到腳上。那些追趕的土匪，聽見槍聲，知道人已結果了。自然退了回去。這是下午大約兩點鐘的事。到晚上，土匪又將寨垣圍住，聲聲要父親出去。寨中知道大股土匪已拉走。這時，在寨外鼓噪的，是埋藏在地下的所謂「夜集明散」的小土匪，同時，寨中人都知道父親曾救過寨中全體人的性命，大家都奮勇守寨。堅持到天明，因為是「夜集明散」的性質，所以那些土匪一見天明，便急忙逃竄無影。第二天，我父親認為大仇已報，惟恐土匪再來擾亂寨垣，於心不安，當天便決定把家遷移到葉縣城裡。我和母親在上午起程到城中，父親晚上也到了城裡。所有傢俱什物，都是後來運到城中的。從此，我家便從鄉間遷移到城中。

我也在城中到學校讀書，告別了傳統讀書的場所——私塾，接受了新教育，進了縣立第一高小。

當時，正是共黨在各處暴動失敗，又在江西瑞金建立巢穴，國軍正在圍剿。各地的報紙和學校，都被共黨份子滲透。我在學校中訂購了上海出版的小說月報、北新，又買了語絲合訂本，同時，創造社的詩和小說，都蒐購了來，自己也摸索着寫作。後來在畢業的一年的下學期，學校中請的國文教員叫周茨平（後來上了軍校）竟是左傾份子，每天夜裡講政治性的故事，他的講法是先講世界，次講全國，再講省區，最後講到縣裡。他用的是大圈套小圈把聽講的人圈住，使聽講的人在不知不覺中聽信了他的話。記得有一次，被校長鄭心魯聽到了。早晨把我找去，給我講三民主義，並且說他是國民黨員，當他入國民黨時，國民黨還正在作地下工作，與他同時的同志被軍閥都殺光了。他算僥倖未被殺害。最後，他誠懇的說，作爲一個青年，千萬頭腦要冷靜，要先將自己充實，想救國要學救國辦法，自己沒有救國辦法，也就是學沒有專長。便想拋頭露面去喊救國口號，行動又是盲動的，不知不覺的被野心家利用，酒熱血拋頭顱，一定是只有破壞，只有搗亂，想的是救國，結果是誤國害國。他的這些話給我的印象最深。同時，又看到郁達夫的訪問記，說是「左聯」命令他去散傳單和到工廠去煽動工人，與他寫作的旨趣不合，就自動退出了「左聯」。知道了「左聯」簡直是利用文人作文藝以外的事，與學習寫作是兩回事。國文教員的花言巧語失了效用，我也拒絕聽他夜間的講話了。從這一段經歷來看，教員和教授是應該特別注意

的職業。據說，過去當權者對謀事者的安排，或無事給他，或認他無能力作事時，便教他去教國文或教公民一類的課程，因而這兩種極有關係的課程，不是被輕視便是被左傾份子竊據，被輕視的便常常亂發牢騷，被竊據的便常常散佈邪說，對學生的思想便極有影響了。我常說三十年代的文藝作品，並不怎麼深刻，但對青年的影響極大，以致影響到大陸的陷共，便是我們在文化教育方面先失敗了的關係。

這幾年在學校中，國恥紀念日特別多，學生們的愛國熱情達到極點。到九一八事變，東北三省在張學良不抵抗的情形下淪入日本軍閥手中，引起全國的震撼、悲憤。我當時參加遊行，喊口號把嗓子都喊啞了。接着又到鄉間宣傳，多數民衆還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我受了這次的刺激，才立志從事文藝寫作，致力「睡獅」、「麻木精神」的喚醒。除領導同學示威遊行外，並撰寫詩歌和散文，在報章雜誌上發表。二十三年三月創辦「藝秋」月刊，二十四年元月，編輯「中原文藝」週刊，同年八月，又增加一週刊，為「新詩世紀」。這兩種周刊均為鄭州「大華晨報」的副刊。至廿五年三月，第一冊散文集「輝河集」出版，並與高紫竿（通俗日報編輯）、程率真（警鐘日報編輯）等創辦「勁風」（文藝月刊）宣傳抗日，至第三期停刊。二十六年二月，編「警鐘日報副刊」，同年三月，至鄭州，編「通俗日報副刊前路」。主旨都是在喊醒睡獅的工作。

二十六年七七事變，北平人士大批南下，火車上都擠得滿滿的，當時我以通俗日報副刊編輯

身份北上，觀察前線情形，預備投筆從戎，當時的前線是一團糟，這個志願沒有達成。在前線只見到從北平來的青年的逃亡潮，他們在政府沒有抗戰時，天天遊行示威要求抗戰要求打，但炮聲一響，竟聽不到他們的聲音，也不見他們實際的行動，只見他們逃亡。可見政府的抗戰準備是重要的，假如沒有準備，只靠煽動和吶喊是沒有用的。我返回家鄉之後，爲了繼續抗戰工作便組織了「青年抗戰工作團」。經費是我獨力支持的。這時，在各大都市求學的青年，紛紛逃了回來，都參加了工作。主要是從事宣傳和組織農村青年。

葉縣的士紳向來不團結，分爲南北兩派，互相磨擦，說起它的來源已有相當長的時間，它是與民國創立以俱來的，南派就是擁護袁世凱的進步黨，北派就是國民黨，遇事暗鬭明爭，永遠不能合作。當時日本大舉侵略，國遇大難，急需排除派系觀念，抵禦外侮，經我奔走協調的結果，南北兩派的少壯人士各推出八人共十六人，結拜爲異姓兄弟，共同致力團結工作。對全縣人民略盡一些謀福利的力量。

由於「青年抗戰工作團」名聲過高，我也被邀約到省裏——當時省府所在地是洛陽——去工作了。民國廿八年五月出版了「抗建文學論」，提倡抗戰文藝運動。

二十八年十二月四日，吳佩孚在北平拒絕日本提出的偽職，被害殉節。國民政府褒揚，全國各地都舉行紀念會。吳佩孚在河南很久，在河南人的心中他的聲望很高，所以紀念他的人更多。

回想吳佩孚是總理孫中山先生目爲大軍閥是要打倒的人，最後又被革命成功的國民政府褒揚，在現代中國軍人中論人格可說是手屈一指的。

五、四十年代（一九四〇——四九）

四十年代的十年，是從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到三十八年，我的年齡是二十六歲到三十五歲。在這十年中，比三十年代的世局更不同。它有最大的歡欣，也有最大的哀悲。它的震撼程度更大。令人有忽然而天忽然而地的感覺。大事件有：汪兆銘在南京成立偽組織、新四軍事件、太平洋戰爭爆發我國對日德義宣戰、蔣委員長任盟軍中國戰區（包括泰國）最高統帥、遠征軍在印緬之戰、中英中美簽訂平等新約、林主席逝世蔣主席繼任、開羅會議、日軍最後之進攻並侵入豫西、雅爾達會議與舊金山會議、原子彈投入日本、日軍投降抗戰勝利、臺灣光復、政治協商會議、國共和談、國府還都、制憲國民大會、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紛擾、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蔣總統就職、戡亂戰爭失利赤禍蔓延、徐蚌會戰、經濟陷入困境、佈置臺灣防務、蔣總統引退、和談、共黨南侵、大陸全部陷共、政府播遷臺灣。這些大事件在當時是與我們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的，有慶祝、有紀念，有戰鬪、有參與，有血有汗，總之，這十年是不尋常的，是歡笑與血淚交織的十年。

從這些大事件中特別要說明的，有下列的幾點：

1. 家鄉淪陷：三十三年四月，敵人動員五個師團侵入豫西，到六月五日，家鄉葉縣淪陷，湯恩伯部撤退，日軍四路縱隊進入縣城。我當天在城西南十五里的劉口莊集合青年百餘人另有民衆一百五十人，槍一百五十支，開始在縣境過「打游擊」的生活，因為抗戰開始時組織「工作團」，有了影響力，全縣各地都有協助的力量，於是襲擊敵人肅清漢奸，並用文藝宣傳，演戲劇、出壁報、講演，都能順利進行，獲得不少經驗。

2. 抗戰勝利：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夜，我正在伏牛山建立游擊根據地，電台台長報告說：聽到廣播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這真是喜從天降，當時便在山區燃放鞭炮，飲酒，大事慶祝起來。第二天就整裝向葉縣的路上進發。縣城收復之後，當時的縣長是本地土豪劣紳出身的崔兆元，模仿軍閥打勝仗時的作風，竟下令地方團隊放假三日，縱容他們在城中和四鄉劫掠三日，我實在覺得像這樣的人怎配作縣長，不得不向各方面控訴，最後將他撤職查辦了事。

勝利後，人人準備自己百年大計的事業，以為抗戰勝利了，天下太平，要為自己打算，於是，接收變成劫收，人人爭權奪利，世局的不堪收拾，剛剛勝利時，國家的敗象已經全面呈現出來。雖經有心人的大聲疾呼，也不能挽回頹風於萬一。

3. 競選國民大會代表：當時國家經過政治協商的紛擾、國共和談的破裂、制憲國民大會的召

開，頒佈憲法，並決定辦理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國民大會代表和立法委員的選舉，都是民衆直接選舉，競爭的激烈，已無法形容，多年已平息的派系糾紛重新挑起，還有中央決定的以黨讓黨的原則，很多地方的代表，中央決定讓予民青兩黨，而民青兩黨的黨員在各縣因爲黨禁沒有開放，數十年沒有活動，選舉當然也有困難，糾紛更大。再說監察委員是由省參會（那時正式省議會還沒有成立）選舉的，省府與省參議會也窮於應付。這次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可以說是從中央磨擦到地方，而且白熱化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就在這種紛亂情況日益擴大中，共黨份子在各地滲透分化，組織民衆，裹脅民槍，勢力突然膨脹起來。所以，後來經學術研究者把行憲定爲失去大陸的原因之一，不是沒有道理的。我葉縣的代表便是讓給民社黨籍的黃自芳，他是選曹錕的國會議員。當時的術語是叫「地雷」，誰想競選，遇到「地雷」便必然要垮，就是選上也要讓出去。幸而我知道的早，避去地雷，改在農業單位的農會競選，很順利的當選爲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

4. 參加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時，共黨已經到處造亂，國都南京爲這次的會議鬧得天翻地覆，會議外，是讓黨的代表在集會，有的抬棺材，有的絕食。會議內，爭主席團，爭副總統。最後選出的副總統李宗仁是與總統不合作的。所以說，那次的會議不是成功的會議。所選出的副總統到戡亂戰爭逆轉時，他真的演出了逼宮的一幕——總統蔣公引退。

5. 南京疏散，追隨政府到臺灣：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南京疏散，我乘夜車離京，乘車時人山人海，爭先恐後，擁擠不堪，我的一個小皮箱，內裝文稿及詩集「人間集」，評論文集「讀書雜寫」，稍嫌沉重，竟被腳夫認為是金銀之類，悄悄偷走。這事於那腳夫毫無補益，於我的損失可大了。

這一次，離京，經上海轉浙贛路到長沙。一路上，所遇見的都是逃難的，好像一個雜誌，還出版了一期「逃難專號」。本來，江南的風景極好，詩詞歌詠很多，到這時，詩詞都想起不起，好像優美的風景都塗上了一層驚恐之色，一起逃難的人面對這大好河山，也只有惋惜和嘆息了。

在長沙，會見了當時的長沙綏靖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程潛，他表示歡迎。但在長沙所見的景象，則是倡言和平的空氣很濃厚，似乎不是固守長沙的意思。我正在憂慮之時，三十八年元旦來臨大地，長沙民衆一片歡欣過年的熱鬧景象。程潛爲慶祝元旦，也在省府大禮堂宴請到長沙的客人和湖南省的士紳與民意代表。記不清是多少桌了，只記得很多。在那次的餐會中，使我提高了警覺，覺得長沙不是久留之地。因爲，我聽到每一餐桌上，所談的都是毛澤東，有的說毛是他的表弟，有的說毛是他的學生。……那一餐，真使我如坐針氈，食不甘味。

沒有幾天，南京發生大變化：三十八年一月上旬，天津郊區，展開血戰。戰到十五日，將士犧牲殆盡，天津陷落。市長杜建時及陳長捷將軍皆殉國。共軍亦死萬餘人。十九日，蚌埠失守。